

領南歷代

祖道家評傳



嶺南歷代思想家評傳

丁宝兰 主编

作 者

丁宝兰 李锦全 陈玉森
袁伟时 吴熙钊 黎洁华
何浩堃 郑海麟 李敦正

画 像

刘济紫

岭南历代思想家评传

丁宝兰 主编

责任编辑 袁耀文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6.5印张 2插页 365,000字

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4,400册

书号11111·121 定价2.95元

前　　言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文明古国之一，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发展都很早，特别在精神文明方面，内容很丰富，其中思想领域，包括政治思想、经济思想、伦理思想、文艺思想、哲学思想、宗教思想等等，各有辉煌的成就。它们题材广博，意义深邃，具有高度的独创性。一部中国思想史，凝聚着历代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民族智慧的结晶。

思想家评传是思想史的一种体裁和表达方式。它和思想史学科的其他体裁一样，应该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之下，不但叙述各种丰富多彩的思想内容，而且要把思想家放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之中，研究他们活动和思想的社会经济根源，探讨他们的言行同其他社会因素的相互联系，分析他们的思想所继承和演变的轨迹。任何思想家都不可能孤立于他所处的历史时代的思想斗争和文化活动的潮流之外，而总是这样或那样地汇入其中而起作用，从而呈现出一定的时代特征和阶级性。思想史的规律正是通过上述诸问题而呈

现出来；或者说，通过上述诸问题的研究才能总结出思想史的发展规律。思想家评传，在一定的意义上，是以人物为中心；但这个中心是个性和共性的统一体。在一定历史阶段，某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以其独特的形式和内容，典型地反映着当时的某种思想潮流，起过重大的社会影响。所以，以人物为中心来写思想史，不是为个人树碑立传，而是遵循个别和一般对立统一的辩证法，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个人的历史作用的原理。这种方法比较具体生动，写得好的话，可以做到史论交融，深入浅出。当然，对于我们来说，这只是奋斗的目标。

我们奉献给读者的这一卷《岭南历代思想家评传》，是一个选论集。书中所论的人物，是我们目前在主客观条件方面便于研究的对象，当然也是我们认为比较重要的对象。岭南地区〔注〕在我国古代虽然开发稍迟，但是，“天涯何处无芳草”？这个地区和全国各地区一样，也是人才辈出，以思想深邃著称的，代有其人。这里的思想家们，同兄弟地区的思想家共同创造了我国的民族文化，他们的著作，也是我国精神文明宝库中的宝贵遗产。

岭南历代思想家的思想有自己的特点、特色。所谓特点，不必是一家独有，别家所无；而往往是大家都有，表现各自不同。据此，我们谈到他们的思想特点和

〔注〕岭南地区，大体上包括现在的广东、广西两省（区），本卷暂只选论广东历代的重要思想家。

特色，绝不意味着那是脱离共性的个性。

首先，岭南思想家历史地表现出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范畴具有具体历史性。在古代，一般地说，在两个方面表现较为突出。其一，是在一定历史阶段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斗争中，如果可以区分为正义和非正义、反侵略和侵略两个对立面，则那些为了维护本国的正义和反对侵略的言行和思想情感，就具有爱国主义意义。如宋代余靖的一些外交策略思想，就有这种特色。其二，古代思想家爱国主义的另一表现是对于腐败倒退的政治经济的改革思想，他们中有的人具有刚强的意志，敢于向旧权威势力抗争，置个人荣辱安危于度外。当然，他们爱的是封建主义国家，但我们应该把人物的思想和活动严格地放在具体历史环境中去评价，爱国主义思想总是同历史上促进社会发展的努力分不开的。张九龄、余靖、邱濬、海瑞等人都有这样的精神。

近代，我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同资本主义列强、帝国主义的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反帝反封建是近代我国爱国主义的集中点。岭南地处祖国南疆，外国侵略势力入侵，广东首当其冲；西学东渐，也在广东接触最早。这种形势，使广东近代思想家们激发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潮。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一方面对惧外、媚外的清朝卖国行径进行武器的批判，另一方面直接英勇地反击外国侵略者，并在外交上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这些使我国历

史上的爱国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朝老大帝国的腐朽面目暴露无遗，瓜分亡国之难，迫在眉睫。救亡图存，成为全国各阶级最强烈的呼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诞生后，它的代表人物终于登上了政治舞台。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容闳、黄遵宪以及在香港活动的何启、胡礼垣等人，在十九世纪末叶都大声疾呼变法、维新、推行新政，特别是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提出了资产阶级的改革纲领，要在政治上用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取代封建专制，在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他们向西方学习，目的是把中国近代化，从根本上使国家富强兴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戊戌维新运动同时也是一场空前深刻的爱国主义运动。戊戌政变后，维新运动一败涂地，但不应因此而否定它的性质和历史地位。代之而兴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革命运动。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廖仲恺、朱执信等人又把爱国主义推向新的高峰。他们的思想特点是不断适应世界新潮流，不断进步。孙中山晚年制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联系的思想倾向。这是十分可贵的。

在岭南历代思想家的思想中，另一个特色是在学术上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惠能致力革新禅宗思想的哲学路线虽然是唯心主义，但他的理论在实质上是对佛教经

卷的烦琐哲学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使禅宗在中国佛教各派中确立了巩固的地位，并从思想理论上给后来的宋明理学以深刻的影响。明代哲人陈献章及其门人湛若水，在心学上独树一帜，史称白沙学派，影响及于全国。近代以来，番禺陈澧、南海朱次琦，标榜调和汉学宋学，在经学上都有较高造诣。陈澧著书百余种，以博学名重一时。他们都强调治学旨在经世致用，有力地扭转了白沙学派那种以静坐高于一切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偏向，并对后来从广东出发的维新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发生积极的思想影响。陈、朱二人的思想有一定的启蒙意义。后来，康有为、梁启超、胡礼垣、孙中山、朱执信等人，在哲学上都有专著；康有为的哲学思想包含着相当丰富的辩证法，孙中山所著《孙文学说》，在哲学史上是我国资产阶级的第一个唯物主义体系，它们都是各自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的精华。至于政治、经济和其他思想理论，近代岭南思想家每人都有建树。这些在学术上作出了卓越成就的思想家们，把心血贡献给祖国，为国争光，使中国屹立于世界的学术之林。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是一批可敬的爱国学者。当然，他们的学术思想不都是优点，不都是正确的，其中包含缺点、错误，如一些封建糟粕、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我们也必须恰如其份地加以分析批判。

我们研究历史，不是怀古，而是为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是脱离

民族文化遗产的偏狭东西。祖祖辈辈勇于追求真理、热心社会变革和爱国主义等思想传统，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使之发扬光大。如果说，先辈们在艰苦的历史条件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精神财富，那末，我们今天更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松懈创新的努力。

这个集子是集体撰写的。其中有老年同志，也有中青年同志，我们共同承担科研任务，并采取独立研究和主编协调的办法，力图把工作做好一些。而限于水平，错谬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地盼望读者不吝赐教，幸甚幸甚！

丁宝兰

一九八三年十月

目 录

前 言.....	1
惠 能评传.....	1
张九龄评传.....	27
余 靖评传.....	49
邱 澄评传.....	69
海 瑞评传.....	95
陈献章评传.....	119
朱次琦评传.....	146
陈 澄评传.....	161
洪秀全评传.....	181
洪仁玕评传.....	206
容 阔评传.....	234
郑观应评传.....	261
胡礼垣、何启评传.....	285
黄遵宪评传.....	312
康有为评传.....	335
梁启超评传.....	370
孙中山评传.....	405
廖仲恺评传.....	433
朱执信评传.....	465
刘思复评传.....	497

惠能评传

一、中国禅宗的发展与惠能

惠能(或作慧能)是中国佛教禅宗南宗的始创者。我们评述惠能及其禅学，必须了解什么是禅学，以及禅宗在中国形成、发展的过程。

“禅”是佛教修行的一个重要途径。“佛”是无上的、正确的、彻底觉悟的意思。“禅”的全名是“禅那”，是梵文的音译，意即“静虑”。佛教认为要彻底觉悟，要解决所谓无上正确的人生观，即是说，要成佛，就必须通过戒、定、慧三个坐禅阶段。所谓戒，就是排除一切恶念、妄念、杂念以安心性；所谓定，就是由静坐而入定。所谓慧，就是由定而生大智慧(即所谓“般若”，是一种不寻常的智慧)，从而彻底领悟“真如”的佛性，也就是领悟人所固有的彻底觉悟的本性。这种本性，是被认为唯一真实的，所以名为“真如”，而其他的一切，佛教都认为是虚妄的。

禅法有多种，主要分“大乘禅”和“小乘禅”，前者志在普渡众生，后者志在个人解脱。它们的坐禅方法，因为主张渐悟，故极为烦琐。特别是小乘禅，工夫更为复杂，决非一般劳动人

民所能接受。

佛学和禅法都来源于印度。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最初盛行于北方。当公元一四七年（桓帝建和元年）佛徒安世高到洛阳后，即宣扬小乘禅学。稍后，公元一六七年（和帝延熹十年）又有支娄迦谶来华宣扬大乘佛教，但不受人重视。至东晋，罗什佛陀跋罗等，译了《坐禅三昧经》、《达摩多罗禅经》等，介绍了大乘，如《念佛法门》等禅法，于是大乘禅开始流行。

公元四〇一年（后秦宏始三年）天竺僧鸠摩罗什来华，翻译了大量佛经。自此以后，佛教由北而南，大乘的“般若学”（获得大智慧，获得成佛所需的特殊认识之学）和大乘禅法一时盛行，大大压倒安世高的小乘禅。大乘禅在南朝刘宋时期，由求跋陀罗翻译了《楞迦经》，成为禅法的主要经典。《楞迦经》提出四种禅法，而以“如来禅”直指佛家的实践究竟，认为人人都有自觉的圣智，可通过“止观”，即不限于传统的静坐默想，除静坐默想外，认为还可能在日常生活中集中注意力，内心观照。主张“离念”，“专唯心慧，不在语言”。中国禅宗的创立，即源于此。可见《楞迦经》虽然主要还是主张静坐安心，渐悟佛性。但另一方面，却也没有排除直照本性的顿悟成佛的可能。

公元五二〇年（梁武帝普通元年）菩提达磨自天竺来华，以《楞迦经》为基础，吸收了其他经典及中国老庄和玄学思想对大乘禅加以简化，提出所谓“壁观”的坐禅方法。什么是“壁观”呢？唐高僧道宣说：“客尘故障，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一等，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同符；寂然无为，名理入也。”（《唐高僧传》卷十六）道宣这样解释达磨的“壁观”是对的。概括地说：就是只承认佛性是真的，而其余都是

慧能



虚妄；人人皆有佛性，凡圣一体，去妄归真就能成佛。这是来源于止观的“静坐安心”。达磨简化坐禅方法而名为“壁观”，就是要求人们在静坐中安心以自照心境，使心境排除外界障碍，不偏不倚，寂然如壁立，坚定不移，达到“无自无他”的境界，即所谓“寂然无为”以见“真如”的境界，这也就是所谓“入名理”。这方法比前简便多了。但是，达磨这种禅法，主要是坐禅而安心以入名理，主张由坐而静，由静入定，由定起慧的渐悟法门，主要仍是以《楞迦经》作为传授心法的根据，是本之《楞迦经》的渐悟禅法。在中国从达磨一代开始，世代相传从而建立了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并于每一代的传授中，以法衣相承为证，表示其为达磨禅学的嫡嗣。从达磨传至宏忍为五代。宏忍以后，分为两派：北方一派为神秀的渐门禅宗，南方一派则为惠能的顿门禅宗。惠能在禅学中又进行了一次根本的改革。

二、惠能的简历

惠能生于公元六三六年（唐太宗贞观十年），卒于公元七一三年（唐玄宗先天二年），原籍范阳（今河北定兴县南固城镇），俗姓卢，父行瑠，母李氏。父在范阳当过官，于唐高祖武德年间（约公元六一三年至六二六年）因罪降职，流放岭南，定居新州（今广东新兴县），编入户籍，做了当地的老百姓。惠能三岁死了父亲，少年时家境清贫，采柴养母。二十四岁时，闻人诵《金刚经》，心有所悟，回家安顿好母亲之后，即跑到黄梅山（今湖北黄梅县境），拜五祖宏忍学佛。宏忍问惠能：“你是何等人，欲求何物？”惠能答道：“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惟求作佛，不求余物。”宏忍说：“你是岭南人，又是獫獠

(古代称西南夷为獮獠，是对岭南人的贬称)，那里能够作佛？”惠能说：“人有南北，佛性无南北。獮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宏忍听了惠能的话很满意，就把他留下来，分配他当寺里杂役，工作完成后才能听讲佛经。惠能在寺里从事工役八个月后，刚巧遇着宏忍命令门徒作佛偈(说佛理的韵文)，看谁觉悟得透彻，以便传授衣法，继承嫡嗣。当时大弟子神秀在墙上写了一偈，众人赞叹，认为衣法必为神秀所得。惠能听了这偈，认为悟道未彻。惠能不识字，自念一偈由别人代写在墙上，宏忍看了，大加赞赏，亲自为他讲授《金刚经》，并授给他衣法，命他即速南归，以免徒众暗害。

惠能回到岭南后，不敢公开他的佛教徒身份，过着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这样，度过了十六年。至公元六七六年(唐高宗仪凤元年)，这时宏忍已经死去两年了，惠能估计当时的形势，认为可以而且应该公开从事佛教活动了，于是赶到广州法性寺(今光孝寺旧址)与当时正在寺中说法的印宗法师(吴郡人，曾谒宏忍求法)谈论佛法，印宗深为佩服。当印宗了解到惠能的身世和师承关系时，于是为惠能公开削发受戒于寺前菩提树(相传公元五〇二年即梁天监元年为天竺僧智药三藏手种，树今尚存)下，开示禅宗衣法单传的法旨，成为宏忍的嫡嗣。惠能在广州说法一年，至公元六七七年遂北上移住曹溪宝林寺(今广东韶关东南马坝的南华寺)说法三十多年，影响十分深远。

在说法期间，惠能先后曾为武则天、唐中宗诏令入京，但他都婉言谢绝。武则天就赐给他百衲袈裟及钱帛等以为供养，中宗也赐给他物品。公元七一三年(唐玄宗先天二年)，惠能在曹溪逝世，俗寿七十六岁。公元八一五年(唐宪宗元和十年)赐谥

“大鉴禅师”。

三、惠能《坛经》的四种版本

惠能不识文字，他的“顿门”禅法以直悟心性为主，不重视文字，所以他没有著作。他的信徒很多，认为可以传法为“一方头”者，有十人，而以法海为首。惠能所说佛法和他的事迹，弟子们记载下来，把它整理，这就是《坛经》。这本经是研究惠能禅学的主要著作。

《坛经》的版本有多种，一般都称“法海集记”，或“法海录”。这可能因为法海在十大弟子中居首，所以用他的名，未必都是法海个人的记录，极可能是集体的记载。现存的《坛经》主要有四个本子：一是《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经六祖大师大梵寺施法坛经》，简称《法海本坛经》，因为是在敦煌发现的，又称《敦煌本坛经》，这是现存最古的本子。这是手抄本，据专家的考证，由字迹上可以断定是五代时写的。“那时南、北宗早已分家，南宗中还分成了数派，可以肯定这个本子就有了改订。”（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222页）二是《六祖坛经》，是依真小师邕州罗秀山惠进禅院沙门惠昕于晚唐或宋初改编的（宋初说据胡适和日本铃木大拙说），简称《惠昕本》。三是《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实际上是北宋契嵩改编的，简称《契嵩本》。四是《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是元比丘宗宝编的，简称《宗宝本》。

由此说来，据现存的《坛经》本子看，都不能尽信是惠能的思想。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其中多有参杂神会的思想。如吕澂说：“一般干脆把《坛经》看成是荷泽（即神会）一系的东西。这